

冯友兰

著

新事论



抗战时期，著名哲学家冯友兰移居西南，反省中华民族何以遭遇此等危险困窘，思考如何摒除民族惰性、改造社会人生、建设美好家邦。这些文章，都从切近的事实、现象入手，辨析历史，检讨得失，呈现前途，是一部别开生面、富有远见卓识的著作，值得社会各界读者阅读参考。

海外借

东方出版中心

新事 论

冯友兰

著

东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事论：中国到自由之路 / 冯友兰著. —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2017.2

ISBN 978-7-5473-1002-1

I. ①新… II. ①冯… III. ①哲学—中国—现代
IV. ①B26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14889 号

新事论：中国到自由之路

出版发行：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电 话：(021)62417400

邮政编码：200336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90×1240 毫米 1/32

字 数：110 千字

印 张：5.375 插页 2

版 次：2017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73-1002-1

定 价：22.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东方出版中心邮购部 电话：(021)52069798

自序

自中日战起，随学校南来，在南岳写成《新理学》一书。此书序中有云：“此书虽‘不着实际’，而当前有许多实际问题，其解决与此书所论，不无关系。”此书成后，事变益亟，因另写一书，以讨论当前许多实际问题，名曰《新事论》。事者对理而言，论者对学而言。讲理者谓之理学，说事者谓之事论。对《新理学》而言，故曰《新事论》。为标明此书宗旨，故又名曰《中国到自由之路》。二十七年为北京大学成立四十周年，同学诸子，谋出刊物，以为纪念。此书所追论清末民初时代之思想，多与北大有关系者。谨以此书，为北大寿。又此书各篇，皆于草成时即在昆明《新动向》半月刊中发表，修正后，成为此书，并记于此。二十八年六月，冯友兰识于昆明。

目 录

自序	1
第 一 篇 别共殊	1
第 二 篇 明层次	13
第 三 篇 辨城乡	26
第 四 篇 说家国	39
第 五 篇 原忠孝	52
第 六 篇 谈儿女	66
第 七 篇 阐教化	79
第 八 篇 评艺文	92
第 九 篇 判性情	108
第 十 篇 释继开	122
第十一篇 论抗建	135
第十二篇 赞中华	148

第一篇 别共殊

荀子说：“类不悖，虽久同理。”（《非相》）荀子所谓理，与我们所谓理，其意义不必同，不过这一句话，我们可借用以说我们的意思。某一类的事物，必有其所以为某类的事物者，此所以为某类的事物者，为属于此某类的事物所同有，即此类之理。一类事物之理，即一类事物之类型。凡属于某一类之事物，必皆依照某一理，或亦可说，凡依照某一理之事物，皆属于某类。所以“类不悖，虽久同理”。

凡属于某一类之事物，必皆依照某理，有某性。所谓性，即属于某一类之事物所依照于某理者。

一件一件底事物，我们称之为个体。一个个体，可属于许多类，有许多性。例如张三李四，是两个个体。张三是人、是白底、是高底，他即属于此三类，有此三性。李四是人、是黑底、是低底，他即属于此三类，有此三性。此不过举例说，其实张三、李四，所

属于之类,所有之性,皆是很多很多底,可以说是不知有许多。每一个体所有之许多性,各不相同。所以个体是特殊底,亦称殊相。而每一类之理,则是此一类的事物所共同依照者,所以理是公共底,亦称共相。

我们可把一件事物当成一个体而叙述其所有之性,或其所有之性之某部分。此等叙述是历史。我们亦可把一件事物当成一某类之例,而研究其所以属于此某类之某性。此等研究是科学。例如我们可把张三当成一个体而叙述其所有之性,或其所有之性之某部分,如说张三是人、张三是白底、张三是高底等。此等叙述是历史。我们亦可把张三当成一是人底生物之例,而研究其生理。此等研究即是科学,或更确切地说,即是生理学。

科学中所讲者都是关于某类之理论,而不是关于某个体之历史。例如医学中讲各种病,如伤寒、疟疾等。其讲伤寒,乃伤寒一类之病,并不是张三或李四患伤寒之历史。他间或亦讲张三或李四患伤寒之历史,然其讲此历史,并非以其为历史而讲之,而是以其为伤寒一类之病之例而讲之。实际上,张三或李四所患之伤寒病,其细微曲折之处,不必尽同,但均有伤寒病之所同然者。此伤寒病之所同然者,即医学研究之对象。医学研究伤寒病之所同然者,故其所有理论,可适用于实际上任何人所害之伤寒病。

知从类的观点以观事物,我们谓之为知类。科学虽不仅只是知类,而知类是科学所必有之一基本底条件,是一切科学所同然者。

我们可从特殊的观点,以说文化,亦可从类的观点,以说文化。如我们说,西洋文化、中国文化等,此是从个体的观点,以说

文化。此所说是特殊底文化。我们说资本主义底文化、社会主义底文化等，此是从类的观点，以说文化。此所说是文化之类。讲个体底文化是历史，讲文化之类是科学。

我常说，在中国历史中，汉人最富于科学底精神。这是一句很骇人听闻底话，因为照有一部分人的说法，汉人在许多方面底见解，都是反科学底。我承认汉人在许多方面底见解，是与现在底科学不合。汉人在许多方面底见解，以现在底科学，或即以现在人的常识观之，都可以说是荒谬绝伦。不过这些都是就汉人在许多方面底见解之内容说。科学本来是常在进步中底，无论何时代的人所有对于自然之知识，都有与已进步底科学不合之可能。若其不合太甚，则自己进步底科学之观点看，都是荒谬绝伦。但此亦是就此等知识之内容说。此等知识之内容，虽可以说是荒谬绝伦，而其形式则不妨仍是科学底。此所谓形式，即指一切科学底知识所同然者。一知识如其有一切科学底知识所同然者，即是科学底。如一人，或一时代之人，其知识有一切科学底知识所同然者，或求使其知识有一切科学底知识所同然者，我们即说，此一人，或此一时代之人，有科学底精神。

关于汉人之富于科学底精神，有几点可说。此几点中，有几点我们已于别处说过（见《新理学》绪论）。现在只说一点，此一点即是：汉人知类。

汉人之历史哲学或文化哲学，以五德、三统、三世等理论，说明历史或文化之变迁者，就其内容说，有些亦可说是荒谬绝伦。不过他们的看法，却系从类的观点，以观察事物者，就此方面说，汉人知类，汉人有科学底精神。

汉以前有许多不同底文化,若从特殊的观点看,或从历史的观点看,我们可以说:汉以前有殷人的文化,有周人的文化,有楚人的文化等。但有一部分底汉人不从此观点看,他们不从此观点以讲文化。他们不讲殷人的文化、周人的文化等,而讲金德底文化、木德底文化、水德底文化、火德底文化、土德底文化,或黑统底文化、白统底文化、赤统底文化,这些文化都是所谓文化的类型,与什么人无关。殷人可以是金德底文化、白统底文化,但金德底文化、白统底文化之实际底有,则并不限于殷人。我们可以离开殷人,可以离开任何人,而讲金德底文化、白统底文化。此正如张三或李四的病可以是伤寒,但伤寒之实际底有,则并不限于张三或李四。我们可以离开张三或李四,可以离开任何人,而讲伤寒。讲金德底文化、白统底文化,或伤寒,是讲历史哲学、文化哲学,或医学。讲殷人的文化、周人的文化,或张三李四的伤寒病,是讲历史。汉人眼见有许多不同底文化,能从类的观点,将其分类,离开殷人、周人等,而专讲各类文化之类型,此即是有科学底精神。

从类的观点以观事物者注重同,从特殊的观点以观事物者注重异。从类的观点以观事物者,亦说异,不过其所说之异,乃各类间之异,而不是一类中各事物之异。但一类中各事物之异,正为从特殊的观点以观事物者所注重者。例如医学讲伤寒病,固亦须说伤寒病与别底发热病之异,但患伤寒病之张三李四间所有之不同,医学并不讲之。但讲张三李四之历史,或其患病之历史者,其所注重,正是张三李四间之异。汉人不讲殷人的文化、周人的文化等,而专讲金德底文化、黑统底文化等,正是不讲一类中各事物之异,而只注重其同。

《礼记·礼运》说，有大同之治，有小康之治，此亦是说有此二种文化类型。公羊《春秋》家说有据乱世，有升平世，有太平世，亦是说有此三种文化类型。就内容说，《礼运》及公羊家之说，比五德说或三统说，较为合于现在人之常识，所以现在人对于《礼运》、公羊家之说，常加称道。但就其皆注重于文化类型说，《礼运》、公羊家之说，与五德三统之说，是一致底。

自汉以后，中国人所见者，只是一种文化，所以对于汉人所有关于文化之理论，不感兴趣，因为他们并没有关于文化方面底问题。及至清末，中国人又看见许多不同底文化，在文化方面，又起了问题，因此对于汉人所有关于文化之理论，又发生兴趣。清末公羊家之学之所以大盛，此是其一重要底原因。

清末人用汉人所说对于文化之分类，以分别其所见之不同底文化。照康有为的说法，“欧美各国”的文化是白统，服色尚白，正朔建子。俄罗斯、回教的文化是黑统，正朔建丑。这些说法，当然是可笑底附会。我们若照样附会起来，我们可以说，资本主义底文化是白统，共产主义底文化是赤统，法西斯主义底文化是黑统。这说法虽亦是可笑底附会，但似乎比康有为所说，还有根据些。

汉人亦有将文化分为文质二种者。公羊家亦说文家、质家；清末人亦有说，所谓西洋文化，是属于质家，中国文化是属于文家者。例如西洋人对于国君，直称其名，中国人对于国君，则讳其名。清末人以为此即文质二家之分之一例。

这些说法，我们现在看来，都是可笑底附会。但是有一点，我们不可不注意者，即是清末人亦是从类的观点，以说文化。就他们所说之内容说，他们所说是可笑底附会。但是他们知类。他们

不注意于一类中底事物间之异而只注意其同。他们不说，中国与西洋，有什么本来底不同，如所谓国民性等。中国与西洋之不同乃由于其所属于之文化类不同。如中国人因文敝而改行质家之法，则中国与西洋即无不同。如西洋人因质敝而改行文家之法，则西洋与中国亦无不同。这种看法，离开其内容说，是不错底。

自民初以来，我们对于西洋之知识，日益增加，渐知所谓西洋文化，决不是一个什么“德”，一个什么“统”，或一个什么“家”所能尽。清末人这种看法，就其内容看，遂成为可笑底附会，而民初人之知识，又不能用别底标准，以为文化分类。他们于是尽弃清末人所说，不但弃其所说，而并弃其看法。他们知清末人之错误，而不知其错误在于何处，遂并其不错误者而亦弃之。这是民初人的错误。

民初以来，一般人专从特殊的观点，以看所谓西洋文化。他们所谓西洋文化，是“西洋”文化，此即是说，是个特殊底文化。这个特殊底文化，在他们面前，好像是一个“全牛”，其中条理，他们看不出。他们常说，中国人如何如何，西洋人如何如何。好像在他们的心目中，中国人之是如何如何，是因为其是中国人；西洋人之是如何如何，是因为其是西洋人。他们似乎不知，至少是不注意，中国人之所以是如何如何，乃因中国文化在某方面是属于某类文化；西洋人之所以是如何如何，乃因西洋文化在某方面是属于某类文化。譬如张三因患伤寒而发烧，李四因患疟疾而发冷。张三之发烧，乃因其是患伤寒病底人，并不是因为他是张三。李四之发冷，乃因其是患疟疾底人，并不是因为他是李四。任何人患了伤寒病，都要发烧；任何人患了疟疾，都要发冷。上帝，如果

有上帝，可以不患伤寒病、不患疟疾，但如果他患了伤寒病，他亦必要发烧，如果他患了疟疾，他亦必发冷。

把所谓西洋文化当成一个特殊底文化看，学西洋亦发生问题。一个个体，是一个特殊，它是不可学底。凡所谓学某个体者，其实并不是学某个体，不过是学某个体之某方面，学某个体所以属于某类之某性。例如孟子说，他愿学孔子。他所愿学而且能学者，是孔子之是圣人之一方面。若孔子之其他方面，如其是鲁人、为鲁司寇、活七十余岁等等，皆是不能学底。说某个体之某方面，即是以某个体为一某类之例而观之，即是从某类之观点，以观某个体。从某类之观点，以观某个体，则某个体于此方面所有之某性，即是其主要底性质。其所有之别底性，即是其偶然底性质。例如从圣人之类之观点以观孔子，则其“圣德”是其主要底性质。其所有之别底性，如是鲁人等，皆是偶然底性质。孟子必如此看孔子，然后孔子方可学。如把一个个体作一整个看，则是不可学底。一个个体不可学，正如一个“全牛”不可吃。

其所以如此者，因一特殊底事物，可以同时属于许多类，同时有许多性。若把一特殊底事物，作为某一类之例而观之，我们固可说此特殊底事物所有之许多性质中，哪些是主要底，哪些是偶然底。但若把一特殊底事物作为一特殊底事物而观之，则此特殊底事物，无论其为何事物，皆是一五光十色底“全牛”。于此五光十色中，我们不能指出哪些是其主要底性质，哪些是其偶然底性质。例如我们把张三当成一个科学家看，我们可知其能研究科学是其主要底性质，至其所有之他性质，如是西洋人，或是中国人等，都是其偶然底性质，与他之是科学家与否毫无关系。但如我

们把张三当成张三看，则不能说，不能指出，张三所有哪些性质是主要底，哪些是偶然底。

一个国家或民族所有之文化，是特殊底文化，是很复杂底，可以同时属于许多类，有许多性。所谓西洋文化，亦属于许多类，亦有许多性。若从一种文化类之观点，以看所谓西洋文化，则于其许多性中，何者是主要底性质，何者是偶然底性质，我们可以说、可以指出。但若从一特殊底文化之观点，以看西洋文化，则所谓西洋文化，亦是一个五光十色底“全牛”，于此五光十色中，我们不能说、不能指出，何者是西洋文化之主要底性质，何者是其偶然底性质。自民初以来，有些人说科学及民主政治，所谓赛先生及德先生者，是西洋文化，有些人说基督教或天主教是西洋文化。崇拜德赛二先生者，固然不一定崇拜上帝，或且反对有上帝之说，但他们既是说“西洋”文化，他们不能说基督教或天主教不是西洋文化。

因为有人以西洋文化为一特殊底文化而说之，所以于其提倡西洋化，或西化时，即引起许多纠纷。近数年来，有主张所谓全盘西化论者，有主张所谓部分西化论者，有主张所谓中国本位文化论者。无论其主张如何，但如其所谓文化是指一特殊底文化，则其主张俱是说不通，亦行不通底。

如所谓西洋文化是指一特殊底文化，则所谓全盘西化者必须将中国文化之一特殊底文化完全变为西洋文化之一特殊底文化。如果如此，则必须中国人俱说洋话、俱穿洋服、俱信天主教或基督教等等，此是说不通，亦行不通底。主张全盘西化论者，实亦不主张此。但若其不主张此，则他所主张即与部分西化论者无异。

但如所谓西洋文化是指一特殊底文化，则主张部分西化论者，亦是说不通、行不通底。因为如以西洋文化为一特殊底文化而观之，则西洋文化是一五光十色底“全牛”，在此五光十色中，我们不能说出、指出，何为主要底性质，何为偶然底性质。如此不能说出、指出，则所谓部分西化论者，将取西洋文化中之何部分以“化”中国？科学家说，西洋之科学，是中国所应取来者。传教师说，西洋之宗教，是中国所应取来者。无论如何说，如果以所谓西洋文化为一特殊底文化而观之，其说总是武断底。

所谓西化论者之主张，虽说不通、行不通，而其主张却已引起有一部分人之大惧。此即主张中国本位文化论者。照他们的看法，中国是张三，西洋是李四，如张三变成李四，则失其所以为张三，即不是张三了。照他们的说法，中国文化有当存者、有当去者，我们应存其所当存、去其所当去。他们亦不完全反对西化，西洋文化中，有可取而为中国所当取者，他们亦主张取之。但如果以西洋文化为一特殊底文化而观之，则其五光十色中，何者是可取而当取者？即就中国文化说，如果以中国文化为一特殊底文化而观之，则所谓中国文化亦是一五光十色底“全牛”。于此五光十色中，我们不能分出，何者是其主要底性质，何者是其偶然底性质。如此我们亦不能说，其中何者是当存，何者是当去。有人说，中国的文言文，是当存者。有人说，中国的旧道德，是当存者。但无论如何说，如果以所谓中国文化为一特殊底文化而观之，其说总是武断底。

有一比较清楚底说法。持此说法者说，一般人所谓西洋文化者，实是指近代或现代文化。所谓西洋文化之所以是优越底，并

不是因为它是西洋底，而是因为它是近代或现代底。这一种说法，自然是比笼统地说所谓西洋文化者通得多。有人说西洋文化是汽车文化，中国文化是洋车文化。但汽车亦并不是西洋本有底。有汽车与无汽车，乃古今之分，非中西之异也。一般人心目所有之中西之分，大部分都是古今之异。所以以近代文化或现代文化指一般人所谓西洋文化，是通得多。所以近来近代文化或现代文化一名已渐取西洋文化之名而代之。从前人常说我们要西洋化，现在人常说我们要近代化或现代化。这并不专是名词上底改变，这表示近来人的一种见解上底改变。这表示，一般人已渐觉得以前所谓西洋文化之所以是优越底，并不是因为它是西洋底，而是因为它是近代底或现代底。我们近百年来之所以到处吃亏，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国底，而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古底。这一个觉悟是很大底。即专就名词说，近代化或现代化之名，比西洋化之名，实亦较不含混。基督教化或天主教化确不是近代化，或现代化，但不能不说是西洋化，虽大部分主张西洋化者不主张基督教化，或天主教化，或且积极反对这种“化”，但他所用底名词却亦指这种“化”。

不过我们说近代文化或现代文化，我们还是从特殊的观点以观事物。我们所谓近代或现代者，不是指古人的近代或现代，不是指任何近代或现代，而是指我们的“这个”近代与现代。我们的“这个”近代或现代，就是“这个”近代或现代，而不是别底近代或现代。它亦是个特殊，不是个类型。因为所谓近代文化或现代文化者，亦是一个特殊底文化；它亦是一个五光十色底“全牛”。在这些五光十色中，我们亦不能指出何者是其主要底性质，何者是

其偶然底性质。飞机大炮与狐步跳舞，是否都是近代文化或现代文化所必须有者？专从近代文化或现代文化说，这个问题是不能问，亦不能答底。因为一特殊底事物所有之性质，就此特殊底事物说，是无所谓主要底或偶然底，说一特殊底事物所有之性质有些是主要底，有些是偶然底，都是从类的观点，以看特殊底事物。

若从类的观点，以看西洋文化，则我们可知所谓西洋文化之所以是优越底，并不是因为它是西洋底，而是因为它是某种文化底。于此我们所要注意者，并不是一特殊底西洋文化，而是一种文化的类型。从此类型的观点，以看西洋文化，则在其五光十色底诸性质中，我们可以说、可以指出，其中何者对于此类是主要底，何者对于此类是偶然底。其主要底是我们所必取者，其偶然底是我们所不必取者。若从类的观点，以看中国文化，则我们亦可知我们近百年来所以到处吃亏者，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国底，而是因为它是某种文化底。于此我们所要注意者，亦并不是一特殊底中国文化，而是某一种文化之类型。从此类型的观点，以看中国文化，我们亦可以说、可以指出，于此五光十色底诸性质中，何者对于此类是主要底，何者对于此类是偶然底，其主要底是我们所当去者，其偶然底是我们所当存者，至少是所不必去者。

照此方向以改变我们的文化，则此改变是全盘底。因为照此方向以改变我们的文化，即是将我们的文化自一类转入另一类。就此一类说，此改变是完全底、彻底底，所以亦是全盘底。

此改变又是部分底。因为照此方向以改变我们的文化，我们只是将我们的文化自一类转入另一类，并不是将我们的一个特殊

底文化,改变为另一个特殊底文化。我们的文化之与此类有关之诸性,当改变,必改变;但其与此类无关之诸性,则不当改变,或不必改变。所以自中国文化之特殊底文化说,此改变是部分底。

此改变又是中国本位底。因为照此方向以改变我们的文化,我们只是将我们的文化,自一类转入另一类,并不是将我们的一个特殊底文化,改变为另一个特殊底文化。

各类文化本是公共底。任何国家或民族俱可有之,而仍不失其为某国家或某民族。如张三是科学家,李四亦是科学家。科学家之类是公共底。张三是科学家,不失其为张三;李四是科学家,亦不失其为李四。张三可在李四是科学家之方面学李四,但他所学者是李四之是科学家,而不是其是李四。张三,李四,除同是科学家外,在别底方面,张三自有其是张三者,李四自有其是李四者。所以如照上所说之方向以改变中国文化,则所谓中国本位文化之问题,自亦不成问题。

在民初人的心目中,康有为是一个国粹论者,是一个“老顽固”。在清末人的心目中,康有为是一个维新论者,是一个叛徒。何以一个国粹论者,能主张维新?固然一个人的思想能前后不一致,但康有为的思想却并不是如此。从他的思想上说,他是从类的观点以观文化,他知各类文化都是公共底,任何国家或民族均可有之,而此各种文化又是中国先圣所已说明者。所以中国虽自一种文化变为另一种文化,而仍不失其为中国,仍是行中国先圣之道。康有为之说,其一半为我们所不以为然,但其一半却是我们所赞同者。